以案释纪说法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
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2025年2月25日

目 录

- ◆ 公职人员充当掮客收受财物如何定性
- ◆ 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并收钱是否构成受贿
- ◆ 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党员干部应担何责
- ◆ “以租为名”收受好处如何定性
- ◆ 收受按揭房产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及数额

公职人员充当掮客收受财物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黄某，A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洋资源管理处副科长；曾某，A市B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二人相熟。2013年5月，B公司有一起合同纠纷诉诸A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某请托黄某去法院“疏通关系”，帮其胜诉。2013年7月，黄某经人介绍认识A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B公司该合同纠纷案的某审判庭副庭长、承办法官许某（另案处理）。2014年2月，许某基于黄某系熟人介绍，同时考虑到黄某是A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干部，大家同在体制内以后可能有事找其帮忙等因素，在审判过程中指导黄某督促曾某补充对其案件胜诉有利的证据材料，并违规将裁判结果提前告知黄某，黄某随即告知曾某。曾某认为其案件之所以胜诉是因为黄某的积极斡旋，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曾某为感谢黄某的帮助，陆续送给黄某共计490万元。

二、案例分析

对于黄某通过许某干预案件并收受曾某好处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是A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海洋资源管理处副科长，虽然其通过许某的违规行为为曾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曾某 490 万元，但鉴于黄某没有利用其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影响干涉许某，黄某的上述行为不构成受贿犯罪，应当以其违反廉洁纪律追究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许某基于黄某系 A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洋资源管理处副科长的身份，同时考虑到其以后可能有事寻求黄某的帮忙，接受黄某的请托，违规指导黄某督促曾某提交对其案件胜诉有利的证据并违规向其泄露审判工作秘密，黄某以此收受曾某 490 万元，构成受贿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三、释纪说法

首先，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斡旋受贿。斡旋受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就自身的职务行为索取或收受贿赂，而是行为人利用其自身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斡旋，使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斡旋受贿所保护的法益是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公正性，以及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人自身职权与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不可收买性。本案中，曾某之所

以请托黄某去法院为其诉讼案件“疏通关系”，主要考虑黄某是体制内的领导干部，有一定的职权和职务影响，由其出面在体制内找关系方便有效。黄某接受曾某的请托，向许某打招呼帮助 B 公司顺利获得案件胜诉。曾某向黄某贿送好处的行为既侵害黄某自身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又侵害法官许某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其次，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认定斡旋受贿的重要客观要件。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斡旋受贿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提出请托事项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人与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并不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有较为自由的意志来选择是否实施该请托事项。但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决定利用自己的职权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考量的重要原因来自行为人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斡旋受贿中，行为人和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一定的职权或职务影响，

双方均可以利用职务互为对方谋取利益。诚然，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不一定当时就想到有何事需求助于行为人以实现权力互换，但是，行为人与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具有权力的可交换性，在双方职务级别上，既可以是同级的，也可以是非同级的；在权力交换的时间上，既可以是即时的，也可以是预期的。

本案中，行贿人曾某称，其之所以找黄某作为沟通司法人员的“掮客”，正是看中黄某公职人员的身份，并积极寻求通过黄某单线联络案件承办法官许某。许某坦言，其考虑到黄某同是市级单位公职人员，以后其本人也可能有事情需要黄某提供帮助，因此才违规提供帮助。由此可见，许某与黄某保持单线联系，接受黄某转请托，为曾某谋取不正当利益，黄某公职人员身份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起到了主要作用，黄某的上述行为应当认定为斡旋受贿犯罪。

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 并收钱是否构成受贿

一、基本案情

赵某，H省某国有C银行副行长，负责私营企业在C银行的贷款审批事宜。李某，H省A齿轮公司（民营企业，以下简称A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某，H省B机械设备公

司（民营企业，以下简称 B 公司）法定代表人。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5 月，李某以 A 公司名义向 C 银行申请多笔贷款，赵某均审核同意。其间，赵某应其朋友崔某请托向李某打招呼，使 A 公司降低对 B 公司的资质审核要求，将 B 公司纳入 A 公司轴承合格供应商名单，并在赵某的要求下，A 公司在有其他更好供货渠道的情况下，仍优先选择 B 公司向其供应轴承。崔某为感谢赵某帮助，先后送给赵某好处费共计 60 万元。截至案发，除去正常经营支出，崔某承接 A 公司轴承业务获利 200 余万元。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对赵某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的行为为请托人崔某谋取利益并收钱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李某系非国家工作人员，赵某利用李某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普通受贿）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斡旋受贿）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赵某不构成受贿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从实质解释角度理解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赵某在贷款业务审批方面对 A 公司形成职务制约关系，赵某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是赵某自身职务行为带

来的现实约束力，本质上是赵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公权力的体现，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赵某同时收受了请托人崔某的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本案中，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三、释纪说法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构成要件分析，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收受型普通受贿罪，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件，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其财物的情况下，已经具备了收受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件，关键是判断是否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

（一）通过具有职务制约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根据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因此，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也包括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其中后者包括隶属、制约和上下级关系。无论具体表现为何，最终都是在本人职权的作用下由本人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职务便利，笔者认为，关键是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制约关系，如果具有，也应当属于利用其自身职务上的便利，从而可以认定构成受贿罪。具体而言，国家工作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有时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在这种制约关系下，国家工作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控制力是单向、直接的，足以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和选择自由，被利用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在国家工作人员的支配下完成受贿的工具，应当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自身职务行为带来的现实约束力，是其职权的直接或自然延伸，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当然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与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同样性质，只不过被利用的对象系非国家工作人员。从非国家工作人员角度看，其业务开展取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特定职权，从国家工作人员角度看，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相比，其职务的制约力更强，更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便利。

（二）对职务制约关系的具体判断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判断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时，应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对受请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为实质判断标准，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具体事项正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比如，非国家工作人员正在参与工程项目招投标，需负责项目的国家工作人员审核竞标企业资质，由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具体办理事项正求助于国家工作人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权限内审批，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力非常强，此时，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会尽力去办，否则将承担对自身不利的后果。这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对受请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制约、影响程度非常高，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自身职权的直接或自然延伸。

二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暂时没有具体事项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但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监督、制约关系。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行政管理通常是指政府管理，比如，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对私企老板的管理等。该款是一种推定承诺谋取利益的情形，目的是将受贿犯罪与人情往来等进行区分，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推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认定为受贿罪。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暂时没有具体事项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对受请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影响程度，能否达到刑法意义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参照该款规定精神处理，即当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时，视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能够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强约束力。此外，笔者认为，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请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虽然不具有行政管理关系，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的某项公共事务能够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监督、制约关系，同样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本案中，李某向 C 银行申请多笔贷款，均需赵某审核

同意，此时，李某为了顺利获得贷款，不得不降低标准帮助崔某的 B 公司获取向 A 公司供应轴承的资格，并优先选择 B 公司向 A 公司供应轴承，从而满足赵某的要求。在李某与第三人崔某的合作上，不是基于市场因素的通行做法，双方交易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综上，可以得出，赵某对李某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其找李某办事，实际上是利用了其负责对私营企业贷款申请的审批这一公权力，李某之所以按照赵某的要求为崔某提供帮助，正是由于赵某的职权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赵某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三）赵某的行为本质系权钱交易，认定其构成受贿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本质上是请托人通过财物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他人财物之间存在对价关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之所以新和隐，主要是在权钱交易上做文章，以表面看似合法的形式掩盖权钱交易本质，从而逃避刑事处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行为，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先利用自身的职权换取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提供帮助，再以非国家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换取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在利益交换链条上虽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处的“中转”，但实质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只是在形式上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延伸，国家工作人员自身的

“权”与请托人给予的“钱”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和交易性，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并且较之传统权钱交易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还通过职权干预民事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社会影响更恶劣，危害性更严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更应纳入刑事规制范畴。

本案中，赵某利用李某的行为为崔某谋取利益与收受崔某财物之间具有内在因果联系，完全符合权钱交易特征。首先，从主观认识看，就请托人崔某而言，其看中的是赵某手中的职权能为其谋取利益，愿意用贿赂换取赵某的权力；就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而言，其之所以愿意违反公平原则为崔某谋取利益，实际是慑于赵某的职权，为了自己的贷款审批能在赵某处获得通过；就受贿人赵某而言，其主观上具有收受崔某财物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能够认识到这些财物是对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崔某谋取利益的回报。其次，从客观行为看，赵某充分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具有职务上制约关系的李某的行为，使崔某违背市场规则获取了利益。最后，从最终结果看，赵某通过李某帮助崔某获得了较大利润，并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崔某财物，这两个行为前后连贯、相继衔接，二者之间联系紧密。综上，赵某利用职务上具有制约关系的李某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受贿。

（四）赵某的行为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

性，具有惩治的必要性

法益是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不可收买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职务行为本身的不可收买性，二是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使得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保持信赖，从而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正常秩序管理运转。一旦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被收买，公民将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持不信任态度，进而对国家机关的管理秩序产生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以职务行为换取了请托人的财物，侵犯了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损害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损害干群关系，败坏国家机关声誉。

本案中，赵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理应在自身职权范围内正确履行职责，但面对崔某的请托，其违规干预市场规则，以其职权使受其制约的李某为崔某提供帮助，并据此收受崔某给予的好处费，在此过程中，赵某负责私营企业贷款审批的职权被财物收买，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已经受到侵害，应以受贿罪予以惩治。

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党员干部应担何责

一、基本案情

甲系 A 市副市长；乙系甲的特定关系人，经营某道路建设公司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丙系另一道路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 年 7 月，丙与乙在饭局结识，听说乙跟甲关系非常密切，能够承接 A 市各种大小工程，遂请托乙帮助承揽某道路工程项目。乙代表自己公司与丙签订虚假的投标代理合同，合同价格为 600 万元。后乙找到甲告知想承揽该工程，甲认为乙想承接该工程，遂跟负责该工程的下属丁打了招呼，并让乙与丁对接。乙通过丁帮助丙的公司顺利拿到道路工程项目，丁向甲汇报“事已办妥”，但没提及其他具体情况。2022 年 3 月，在乙及其公司未付出代理投标劳务的情况下，丙送给乙 600 万元，乙为感谢甲的帮助从 600 万元中拿出 100 万元送给甲（未告知甲该款来源），甲对乙收受丙 600 万元不知情。

戊系甲的弟弟，经营某传媒公司；己系某影视公司法定代表人；二人相识。2023 年 6 月，己的影视公司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履行有关程序后，可以在 A 市电视台播出，己想在黄金时间段播出，但这一时段 A 市电视台已经安排了

其他电视剧，已遂请托戊帮忙，并与戊商定通过签订电视剧宣传发行合同的方式送给其50万元。戊找到甲，表示自己正在为某影视公司做电视剧宣传发行，希望能获得甲分管的A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市文广新局）的推荐函，从而可以优先播出电视剧。甲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该影视公司拿到市文广新局的推荐函。2024年2月，已支付戊50万元，戊及其传媒公司实际未付出任何宣传发行劳务。甲对戊收受已50万元不知情。2024年3月，甲案发。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对于甲、乙、戊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利用职权帮助丙顺利拿到道路工程项目，乙为甲的特定关系人，丙向乙输送600万元利益，就是为了感谢甲和乙的帮助，应认定甲和乙共同受贿600万元，丙为行贿人。同理，甲利用职权帮助已顺利拿到该市文广新局出具的推荐函，戊为甲的特定关系人，已向戊输送50万元利益，就是为了感谢甲和戊的帮助，应认定甲和戊共同受贿50万元。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利用职权为丙谋取利益，丙向乙输送600万元，乙将其中100万元送给甲，应认定甲、乙构成共同受贿100万元，对于另外500万元则应认定乙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甲虽帮助已的影视公司拿到该市文广新局出具的推荐函，但对于戊收受已50万元不知

情，因此，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构成违纪。第三种意见认为：甲主观上是认为帮助乙承揽工程，后通过丁为乙提供帮助并收受乙 100 万元，甲构成受贿 100 万元，乙构成行贿 100 万元。同时，乙通过甲职务上的行为为丙谋取利益，并通过投标代理合同的形式收受丙 600 万元，甲对此不知情，乙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 600 万元，相应地，丙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 600 万元。同理，戊通过甲职务上的行为帮助己的影视公司获得推荐函，并收受己 50 万元，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甲对戊收受 50 万元不知情，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甲不构成受贿，但甲此行为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应定性为违反廉洁纪律。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三、释纪说法

（一）甲收受乙所送 100 万元，构成受贿罪，乙为行贿人

首先，甲、乙不构成共同受贿。共同受贿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受贿，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受贿犯罪主观要件中，各犯罪主体必须均为故意，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意思联络，如一起策划、商议，或者一方转达、告知，另一方认可、默许等；客观要件表现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

利，共同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甲接受特定关系人乙的请托，帮助乙承揽某道路工程项目，甲主观上是认为帮助乙承揽该道路工程项目，并不知道该项目实际上是乙帮助丙所在公司承接，因此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丙谋取利益的故意，甲与乙在主观上没有共同受贿的通谋，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甲、乙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甲收受乙所送 100 万元构成受贿。有观点认为，乙系甲的特定关系人，二人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故往来的 100 万元是二人间的馈赠，不构成行受贿。笔者认为，特定关系人给予行为人财物的情况中，判断是馈赠还是贿赂，可以参照“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本案中，从主观方面看，甲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乙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甲接受乙的请托后，利用职务便利，向负责道路工程项目的下属丁打招呼，帮助乙在工程承揽上谋取不正当利益，甲明知这 100 万元大额往

来是为帮助乙承揽工程项目的对价仍予以收受。从客观方面看，乙为感谢甲的帮助送给其100万元，乙虽系甲的特定关系人，但送给甲100万元是为了感谢其帮助自己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并非感情因素。因此应认定甲受贿100万元，乙为行贿人。

（二）乙收受丙600万元，戊收受已50万元，乙、戊均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本案中，乙是甲的特定关系人，戊是甲的弟弟，均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要件。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中，为请托人谋取的必须是“不正当利益”，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乙通过甲职务上的行为为丙谋利，违反公平公正原则，侵犯了其他公司平等竞争的权利，谋取的显然属于不正

当利益；戊请托甲利用职权为某影视公司获得市文广新局的推荐函，从而可以在 A 市电视台黄金时段优先播出某电视剧，某影视公司获得经济利益，也属于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此外，在乙及其控制的公司实际未付出任何投标代理劳务，戊及其传媒公司实际未付出任何宣传发行劳务的情况下，丙向乙输送 600 万元，已向戊输送 50 万元，所谓的投标代理合同以及宣传发行合同仅是双方利益输送的掩饰，并非正常市场行为。因此，应认定乙和戊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三）戊收受请托人财物，甲虽不知情，但仍应认定甲违反廉洁纪律

党员干部近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对方财物，党员干部本人不知情的，如何定性一度存在争议。但是从 2015 年《条例》起，就明确将此类行为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该条重点强调党员干部有义务管好身边人，不要

让公权力成为党员干部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的工具，适用本条的关键在于，党员干部对近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不知情，如果知情则涉嫌共同受贿。对于此情形，党员干部虽不构成犯罪，但并不意味着毫无责任。根据《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虽然党员干部不知情，但如果情节较重或严重，比如收受财物数额较大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仍构成违反廉洁纪律。

本案中，甲虽然接受戊的请托，利用职权帮助某影视公司拿到该市文广新局出具的推荐函，但对于戊收受他人财物，甲事前事后均不知情，不具备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因此，不应认定甲与戊构成共同受贿。但是甲的此行为符合《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主客观要素，且情节严重，故应认定甲违反廉洁纪律。

此外，对于乙收受丙 600 万元，甲并不知情，对甲的此行为是否应适用《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处理？笔者认为，在甲完成乙的请托事项过程中，其主观上是认为在帮助乙承揽某道路工程项目，并不知道实际上最终是丙的公司承揽了该项目，因为乙的道路建设公司也可以承揽该项目，且下属丁在完成请托事项后仅简单向甲汇报“事已办妥”，并没有说明到底是哪家公司承揽了该项目。因此，在该起谋利事实中，甲主观上只知道乙而不知道丙的存在，在这一前提下，

甲的行为并不符合《条例》第九十四条关于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要件，不适用《条例》第九十四条对甲的行为进行定性。

综上，本案中，应认定甲受贿 100 万元，乙利用影响力受贿 600 万元、行贿 100 万元，戊利用影响力受贿 50 万元。同时，对于戊收受请托人 50 万元，甲虽不知情，但仍应认定其违反廉洁纪律。

“以租为名”收受好处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甲，A 市副市长；乙，B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 A 市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甲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乙提供帮助，乙多次向甲表示想要感谢。2017 年，甲以亲戚名义买了一套房屋（高层，毛坯房未装修），一直想对外出租却未能成功。2018 年初，甲叫上乙到此房屋处并告知房子由其实际持有，问乙是否有租房需求。乙表示虽没有租房需求，但仍愿意承租，且乙明知此房屋是毛坯房租不出去，甲只是想以此名义要钱。甲随即决定房屋每月租金 7500 元，年租金 9 万元，租期四年，一年一付，乙表示同意。为掩人耳目，乙另拉 C 公司承租，双方约定以甲亲戚和 C 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具体事项全部由乙司机对接，后甲将房屋钥匙存放于乙司机

处，但 C 公司实际并未使用该房屋，也未从乙司机处取走钥匙，从未与甲联系协调开通水电气等事宜。甲从乙处得知 C 公司实际并未使用房屋时，也并未多说一词。经查，乙没有从 B 公司账户支取费用，而是将“租金”通过 C 公司账户转给甲亲戚，最后转到甲账户，甲对上述情况均知情。2018 年至 2021 年，甲以租金名义先后 4 次收受乙所送共计 36 万元。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对甲收受 36 万元“租金”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将房屋出租给乙，是民事行为，甲付出了四年的房屋使用权，乙付出了 36 万元房租作为对价。但甲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本人实际持有的住房出租给管理服务对象并收取租金，谋取私利，违反廉洁纪律。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房租”中包含了房屋使用价值，也包含甲职务行为的对价。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甲属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应将其实际收受的“租金”与鉴定机构鉴定的此房屋市场租赁价格的差价作为受贿数额。

第三种意见认为：该行为本质上是甲以收受房屋租金为名收受乙所送贿赂，因承租人并无租赁需求，也并未实际使

用该房屋，租赁不过是利益输送的“道具”，对于36万元“租金”应全额认定为甲的受贿数额。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三、释纪说法

（一）甲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受贿

从主观方面看，甲具有收受乙好处的主观故意。作为领导干部的甲，明知乙并无租房需求，仍通过租房的方式从乙处获取利益。所以甲得知C公司实际并未使用房屋时，并未多说什么，可见实际情况与其心理预期一致。承租公司长期未与甲联系协调水电气等事宜，甲也心知肚明，并不过问。而乙在没有租房需求的情况下，虽明知此房屋是毛坯房租不出去，甲只是想以此名义要钱，但仍表示愿意承租。在这种情况下，甲利用职权为乙谋利，又安排了房屋租赁，事实上双方“心照不宣”地完成了交易，对于该出租行为本质上是权钱交易行为，双方均心知肚明。从客观方面看，甲利用职务便利为乙谋取利益，并以收受“租金”方式收取了贿赂款。一方面，甲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乙提供帮助，其之所以能成功将房屋租赁给乙，与其职务职权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从甲非法收受财物来看，乙以租金名义先后4次向甲输送利益共计36万元，租房收益本质上是甲职务行为的对价。综上，甲通过出租房屋收受乙好处，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二）甲乙之间的“租赁”行为违背市场规律，不是正

常的民事行为

正常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与承租方在自愿、平等、公平、等价有偿的基础上进行民事经济活动，收取合理的租金，并承担市场风险，其租赁行为就不属于受贿犯罪。本案中，甲乙双方虽然通过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C公司账户转账等多种方式试图给利益输送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但仍无法掩盖其权钱交易本质。一是甲乙之间的租赁行为违背公平原则。甲是曾利用职权为乙谋利的领导干部，乙是甲的管理服务对象，乙存在感谢甲并进一步谋求甲关照的心态，甲主动将自己实际持有的房屋出租给乙，拍板决定租赁单价、租期时长，签订合同时甲也无需考虑市场价格变动、空置等多种情况，不承担任何经济风险，坐等“租金”按时到账，甲在“交易”中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乙在没有租房需求的情况下仍同意租赁，且租赁后未实际使用房屋，双方的租赁行为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二是房屋出租对象仅针对特定人。甲在房屋闲置期间一直寻求出租，但因房屋处于高层且属于毛坯房，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用来仓储，均没有人愿意承租。而乙多次对甲表示想要对其感谢，因此，甲才要求乙这名对其“有所求”的特定人员承租，通过获得“租金”的方式收受乙的好处，本质上属于特定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披着“租房”外衣的权钱交易行为。

（三）受贿数额应按照全部“租金”认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所收“租金”中包含了房屋使用价值和甲职务行为的对价，应将实际收受的租金与鉴定机构鉴定的此房屋市场租赁价格的差价作为受贿数额。笔者不赞同该意见，甲乙之间并非真实租赁关系，而是以“租房”为幌子掩盖行受贿行为，应透过现象看本质，以甲收到的全部“租金”认定受贿数额。正常租房行为中，承租人因存在真实的租房需求，其租用房屋后会立即用于生活、工作之中。本案中，承租人并没有租房需求，该房屋为毛坯房，C公司没有从乙司机处取走钥匙，也没有开通水电气，实际上并未使用。因而从本质上分析，甲以出租房屋为名，乙实际无用房需求被甲“摊派”租赁，乙为感谢甲答应承租，且租房后没有实际使用，甲如期收到乙的“租金”，与直接收受乙贿赂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不需要考虑差价的情况，受贿数额应当按照甲收取的全部“租金”认定。

收受按揭房产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及数额

一、基本案情

甲，某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乙，某医疗设备销售代理公司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期间，甲利用担任某县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在工程承揽、设备销售、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1143万余元

元。其中，乙为感谢甲的帮助，提出在甲的老家买套房产送给他养老，甲表示同意。随后，乙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一套价值 392 万余元的商品房，并支付首付款 100 万元，向银行按揭贷款 292 万余元。此后，乙每月归还贷款本息，甲从未过问房款支付情况。甲收到该房后，对该房产进行了装修，未与乙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至案发时，乙已偿还银行贷款本金 82 万余元和利息 76 万余元，尚有 210 余万元贷款本金未还。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对于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既未遂形态及犯罪数额如何认定，存在以下五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案发时乙已实际支付的数额认定，即首付款、已偿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258 万余元。理由为：正常情况下，甲若想得到该房产，应当自己承担购房的所有费用，包括购房款和贷款利息。乙送给甲房产，使甲免于承担本应由自己支付的购房费用，这部分由乙代付的费用即是甲收受的好处。由于购房费用尚未完全付清，因此案发时乙已代甲支付的购房费用即为甲的受贿数额。第二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案发时乙已实际支付的房产价值认定，即首付款和已偿还的贷款本金共计 182 万余元。理由为：虽然乙代甲支付的购房费用包括购房款和贷款利息，但就甲而言，其

实际获得的利益是房产本身的价值，购房是否贷款不是其考虑和决定的事项，与其收受的好处无关。乙支付的贷款利息属于其行贿犯罪成本，不应计入受贿数额。第三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该房产的总价值 392 万余元认定，且全部既遂。理由为：甲收受乙的财物是房产，属于具体的“物”。交房后，甲对房产进行了装修，实现了对房产的控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应当以房产总价值认定为受贿既遂。至于购房贷款，是乙个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与甲无关，不影响受贿既遂的认定。第四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该房产的总价值 392 万余元认定，但系受贿未遂。理由为：由于该房产被抵押贷款，案发时贷款尚未还清，在乙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银行有权对该房产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该房产的价款，可见甲并未对该房产实现完全的控制，故不宜认定受贿既遂，应认定甲收受价值 392 万余元房产未遂。第五种意见认为：甲收受乙房产的受贿数额，应当以该房产的总价值 392 万余元认定，其中已支付的首付款和贷款本金共 182 万余元为既遂，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 210 余万元为未遂。乙已支付的贷款利息属于其行贿犯罪成本，不计入甲的受贿数额。本案中，笔者同意第五种意见。

三、释纪说法

（一）甲收受的是乙送予的房产，而不是购房款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里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以及财产性利益。房产作为不动产，属于典型的“物品”，同时作为商品，也可以使用货币购买。因而，在行贿人承担全部购房费用的情况下，认定收受房产型受贿与代为支付房款型受贿，容易产生一些混淆。笔者认为，判断收受对象是房产还是代为支付的房款，关键在于行受贿双方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表现，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研判。具体而言，代为支付房款型受贿中，双方约定的是由行贿人代为支付受贿人指定房产的房款，可能是全部房款，也可能是部分房款，受贿人深度介入购房活动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行贿人主要负责支付房款、配合完成购房行为。而收受房产型受贿中，双方达成的合意是行贿人将房产送予受贿人，客观上受贿人实际收受了房产。至于购房活动，一般由行贿人自行负责，受贿人则不会关注和深度介入，也不会支付任何房款。这种情况下，受贿人收受的房产是一个整体的“物品”，应当以该“物品”的总价值作为计算受贿数额的基础，然后再研判受贿犯罪的既未遂形态。

本案中，乙提出由其在甲的老家买套房产送予甲，甲表示同意，双方就收送房产达成了合意。后续，乙全权办理了买房、贷款等购房事宜，甲全程未参与和过问，也未支付任

何购房费用。两人的行为表现符合双方前期对收送房产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收受房产型受贿，受贿金额以房产总价值392万余元认定。

（二）甲收受的房产设有抵押权，抵押权不影响受贿成立

收受房产型受贿以实际占有为犯罪认定标准。在民事法律中，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和变更以不动产登记为生效条件，这是基于民法对不动产物权的确认和保护、由法律拟制的要式行为，侧重于对行为形式要件的考量。而刑法的任务与民法不同，重点在于惩罚犯罪，关注的是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刑法判断更强调实质与事实。“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可见，在受贿犯罪中，收受他人包括不动产在内的物品，不以办理不动产登记为前提，而是以实际取得为认定标准。只要受贿人实际取得了房产，受贿犯罪即成立。如，受贿人拿到房产钥匙、装修、自行居住、出租出借等行为，均是受贿人对房产事实上的支配、控制的表现，足以认定受贿人已取得了房产。

抵押权不改变房产的实际占有。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

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抵押权的特点在于抵押期间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因此，在收受按揭房产受贿中，行贿人以所购房产作担保向银行按揭贷款，银行取得房产的抵押权，但并不实际占有房产，而行贿人将房产送予受贿人后，房产由受贿人实际占有，银行的抵押权自始至终不会决定房产的实际占有状况，不会影响受贿的认定。

本案中，虽然甲与乙并未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转移登记，但交房后，甲对房产进行了装修，实现了对房产的实际占有，收受房产的行为已完成，甲已构成受贿犯罪，该房产上的抵押权不影响甲受贿的认定。

（三）抵押权对收受按揭房产受贿既未遂数额的影响

房产作为可以交易的商品，除具有物品的自然属性外，还具有商品的价值属性。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第三百零四条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可见，法律允许一个不动产被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且可以被分割，即使物理上不能进行实物分割，其经济价值也是可以

被分割的。

在收受房产型受贿中，行贿人将房产送予受贿人，受贿人实际占有了房产，从“物”的角度看，行受贿双方完成了对房产的收送行为，已构成受贿犯罪。从房产的价值角度看，若此时该房产上不存在任何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则受贿人理所当然获得了房产的全部价值，以全额认定既遂并无争议。

但如果房产上设有合法的抵押权，则根据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以及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抵押财产并优先受偿”，行贿人向银行贷款并以涉案房产作抵押时，抵押权对应的房产价值应当优先保障抵押权人实现担保物权，这部分房产价值并不被受贿人实际控制，受贿人尚未实际获得房产的全部价值。可以说，受贿人收受的是部分价值受限的房产，在行贿人对应贷款未全部偿还之前，银行的抵押权会影响受贿人取得的经济价值。刑事司法应当尊重民事法律关系对经济利益的分配结果，就此种受贿的犯罪形态而言，此时呈现出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状态。并且，随着行贿人的还贷，贷款余额逐渐减少，受抵押权影响的房产价值也随之减少，受贿人实际控制的房产价值则相应增加，受贿未遂与既遂的数额发生此消彼

长的变化，直至案发。因此，受贿既未遂数额的认定，应以案发时受贿人实际控制的房产价值来确定，即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所对应的房产价值为未遂，其余部分房产价值为既遂。至于行贿人已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是行贿人购房的融资成本，与受贿人实际获得的利益无关，属于行贿人的行贿成本，不应计入受贿数额。

本案中，甲收受乙价值 392 万余元的房产，其中乙支付的首付款 100 万元和案发时已偿还的贷款本金 82 万余元所对应的房产价值，已被甲实际控制，应当认定既遂；案发时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 210 余万元所对应的房产价值，由于受到银行抵押权的限制，尚未被甲实际控制，应当认定未遂；乙已支付的贷款利息 76 万余元属于行贿犯罪成本，不计入受贿数额。故应当认定甲受贿 392 万余元，其中 210 余万元未遂。

（四）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甲收受的房产中既遂部分应予追缴，未遂部分优先保障银行行使抵押权。法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这不仅是民事法律的原则之一，也是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公民财产的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明确，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可见，刑事法律对违法所得的追缴始终秉持公平正义理念，不仅要剥夺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

取的一切非法利益，同时还要保护其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因此，在收受按揭房产的受贿案件中，对受贿人违法所得的追缴数额应当与受贿人通过犯罪实际获利的数额相当，即案发时受贿人已实际控制的房产价值，同时保障银行对尚未还清贷款所对应的房产价值行使优先受偿权。这也与此类型受贿的既未遂认定相契合。

此外，实践中还需注意，收受按揭房产与收受其他贷款购买房产在认定受贿既未遂上的差异。收受按揭房产的受贿数额之所以部分认定既遂、部分认定未遂，其根源在于房产上附着有其他物权，而物权与物密不可分，其他物权的行使必然会影响房产价值的归属。而如果收受的房产没有附着其他物权，不会有第三人对房产提出基于物权的主张，房产的价值是完整的，那么受贿人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房产的全部经济价值。即使行贿人购买房产的钱，是向他人借的或者以其他担保方式融资而来的，只要没在房产上设立抵押权等物权，则仅是行贿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与房产权无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无权对房产提出物权主张，不会影响受贿人实际控制的房产价值。因此，收受通过其他方式贷款购买的房产，理应以房产的全部价值认定既遂。

(本期内容选编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送：省直工委领导班子成员、省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
发：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机关纪委，省直工委各部门（单位）
负责人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2025年2月25日印发

（2025年第2辑·总第59辑，共印30份） 组稿：李 强